长堤永固 浮玉流芳

——余杭治苕溪史略记(一)

○ 吕 洋

发现苕溪之美

编者按

河流,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文明的书写者。它为早期农业文明提供了生存基础,也孕育了人类最初的定居点。之于余杭,苕溪不仅滋养了肥沃的土地,更是一条交通、贸易与文化传播的纽带,见证了余杭从古至今的繁荣与变迁。

纵观历史,人类与河流打交道并非一帆风顺,从最初的敬畏自然,到后来的改造利用,人类对河流的认识和利用方式不断演变。苕溪,赋予余杭人"逆流而上"的勇气,面对自然灾害时,有"人定胜天"的信念;它也教会余杭人"顺流而下"的智慧,不断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径。

今天起,本报推出"苕溪治水史略记"专栏,带读者回顾苕溪治水历程中那些劈波斩浪、开渠筑堤的瞬间,探寻余杭人民如何在与自然的博弈中汲取智慧,并将这份智慧薪火相传,书写与水共生共荣的壮美篇章。

01 天目诸水奔流入此 苕花飘似浮玉其间

苕溪之名早在先秦典籍《山海经》中便已留下印记,书中记载:"又东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区……苕水(苕溪)出于其阴,北流注于具区。"寥寥数语勾勒出苕溪的地理轮廓。清代学者郝懿行在《山海经笺疏》中考证,"浮玉之山"即为巍峨的天目山,"具区"便是浩渺的太湖。这一考证,不仅证实了先秦时期人们对苕溪水文情况的初步认知,也揭示了苕溪与天目山、太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苕溪发源于天目诸山,蜿蜒流经两郡六邑,最终汇入烟波浩渺的太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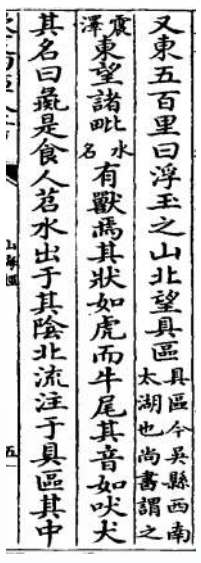
苕溪并非一条孤立的河流,而是由东、西两源汇聚而成。东苕溪自天目山南麓奔涌而出,绵延165公里,流域面积达2830平方公里;西苕溪则发源于天目山北,全长145公里,流域面积更为广阔,达到3310平方公里。东苕溪发源于临安临目马尖岗,部分流域属于余杭境内,流经良渚、径山、黄湖等古镇,自余杭街道折北而流,一般将东苕溪干流余杭镇以上称南苕溪。

苕溪之名源于其独特的自然景观。每当秋风瑟瑟,溪边便会盛开漫山遍野的苕花,如飞雪般轻盈飘扬,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苕花本为"芀花",指的是芦苇的花穗,在苕溪两岸繁茂生长。明代学者朱国桢曾在其著作《涌幢小品》中,以充满诗意的笔触描绘了苕溪飞花如雪的壮丽景象:"(天目)遍山生苕,望之翩翩作凤尾形,苕水出焉。自顶至麓,处处涌溢,山水草合而为一,以此称奇。揆其景象,一似山浮水上,俨然浮玉之义。"这段文字不仅生动地展现了苕溪畔苕花如万千洁白凤尾随风舞动的景象,巧妙地解释了天目山"浮玉之山"这一雅名的由来,却也隐藏着苕溪自古以来的一大隐患——"苕水出焉,自顶至麓,处处涌溢"。

天目山地处浙江省暴雨中心,降水丰沛,使得苕溪流域水量充沛,成为太湖重要的补给水源。然而,余杭地势枕山带水,较为平坦,一旦遭遇倾盆大雨,苕溪水位便会迅速上涨,极易引发洪涝灾害,给沿岸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例如,南宋绍兴五年八月,天目山洪水大发,忽高二丈,毁堤百余处;明成化七年,化湾堤塘决口,灾及杭州;清康熙五十五年,安溪陡门冲坍……据《南湖史话》中的统计数据,从1470年到1969年记录较完整的五百年中,几乎每五年余杭就要遭受一次洪水的侵袭。

一方面,苕溪滋养着余杭,为农业生产提供水源,为经济发展提供便利;另一方面,苕溪的洪水也时常泛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困扰和灾难。这种既依赖又防范的复杂情感,构成了余杭人民与苕溪之间独特的羁绊,也塑造了这片土地独特的治水抗洪文化。从五千年前的良渚开始,到杭州城市重要新中心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余杭,一代代余杭人用自己的辛勤与智慧谱写下了治水营城的篇章。

苕溪入秋 汤荣华/摄



又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具區今吳縣西南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東望諸毗水名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彘是食人苕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具區其中

《山海经》中记载苕溪

02 在茅草与"烂泥"之间 文明的智慧曙光闪耀

五千年前的良渚,每当亚热带季风裹挟着暴雨在天目山麓呼啸而过,暴雨灌注的苕溪水系凶猛如野兽,将两岸金黄的稻田、翠绿的菜畦、精致的木屋一同吞没。良渚遗址三面环山,呈簸箕状,所在地本为西部山区雨水冲积成的平原,在雨季很容易成为天目诸山的"蓄水区"。因此,如何将"水患"变为"水利",已然成为当时的良渚人亟需解决的生存问题。

面对"水浩洋而不息"的灾难,先民们以超凡的工程智慧,在苕溪上游筑起了一座"水上长城"。2015年,一个震动考古界的发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让世人意识到:原来五千年前的先民,早已掌握了堪比现代工程的治水智慧。

在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中,一系列长堤和水坝构成的"三重防线",堪称抵御洪水的"铜墙铁壁":谷口的高坝如巨手扼住了山麓汹涌的水流;平原上的低坝形成了面积达9平方公里的二级库区,有效疏导了洪流;塘山长堤则以60米宽的断面横亘在洪水的必经之路上。整个水利系统的影响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面积比15个西湖还要广阔。

良渚先民的智慧并不仅限于超越时代的"水利工程设计",在老虎岭水坝遗址,几处古老的"黑科技"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些水坝剖面上密集分布的圈状物体,正是良渚先民的"材料物理学"成果——草裹泥。所谓草裹泥,就是用茅草、芦荻等植物纤维裹着淤泥,以纵横交错的方式铺筑于坝体之中,这些"草包"让土体内部的摩擦力和抗拉强度都得到加强,神奇地让"烂泥"抗冲刷能力提高了3倍,使良渚水坝可以阻挡960毫米的短期连续降水,足以抵御本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

既然洪水的危害在人类智慧的帮助下得以遏制,那么如何"转害为利",探索出一条属于良渚人的发展路径呢?事实上,良渚水坝不仅在防洪方面发挥作用,大坝筑起的水道也承担起运输的重要职能。考古发现显示,良渚的城内古河道体系呈现出网状分布的特征。根据不同地形特征,有的河道由人工挖掘,有的则是在天然河道上进行改造;同时,城墙基址两侧沿线建有护城河,还有穿越高台建筑群的输水干道,共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水利交通网络。

更令人惊讶的是,据碳十四技术证实,水坝建筑的年代竟比古城建设的年代还要久远,这就意味着在良渚城正式建成之前,先民便已经画好了这一套河道交通系统蓝图,这些河道上运输的各种建筑用材、粮食作物、生活用具则帮助良渚古城建设完备,良渚先民们每天划独木舟"上下班",极大程度上便利了生产和生活。

良渚先民们以卓越的智慧和创新的实践,成功地将自然灾害转化为生存与发展的机遇。他们不仅在水利工程上取得了显著成就,更孕育了深厚的水利文化,为后世的水利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良渚文明的精神,将继续激励着一代代余杭居民,探索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杭州余杭仓前苕溪村的张氏陈列馆里,安静地悬挂着一幅画像。画中人目光深邃,面容清癯。

他叫张莲芬,原名张毓蕖,是晚清时的一位实业家,商办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总理。苕溪水静静流过,是他生命的起点,更承载了他一生对故土的深深眷恋。

张氏陈列馆

苕溪水长 赤子心坚

——余杭实业家张莲芬的报国路

○ 白 沙

少年飘零遇贵人

咸丰元年(1851年),张莲芬出生在苕溪河畔的苕溪村凌村营。九岁那年,太平天国的战火烧到了余杭。年幼的张莲芬跟着父亲张文澜仓皇逃难,二人不幸失散,张莲芬孤身流落到江苏无锡。淮军将领周盛传发现了张莲芬,心生怜爱,将其收为养子,并按族谱取名"周家骥",待他如己出。

张莲芬的养父周盛传是个颇有见识的军人。他在天津练兵屯田,不仅兴修水利,培育出著名的"小站稻",更早早便尝试引进国外新式武器和训练方法,堪称近代军事改革的先行者。少年张莲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十三岁起,他开始在养父的军营里做些后勤事务,小小年纪便显露出非凡的才干,周盛传在写给家人的信里,曾欣慰地提道:"家骥在此甚为得力。"

凭着这份踏实和才能,张莲芬的仕途之路渐渐铺开。光绪二年(1876年),他因督建天津海口炮台有功,获得了知县补用的资格。此后二十年,他辗转于水利、海关、铁路等多个重要岗位,官至二品的直隶候补道、山东盐运使。光绪二十年(1894年),因督办北洋海防得力,朝廷赏赐他二品顶戴。

实业救国志在矿

官场之路看似平顺显达。然而,张莲芬的心头,始终萦绕着更深沉的念头。目睹国家积贫积弱,他深感仅靠做官难以真正救国;实业,尤其是掌握国家命脉的矿业,才是强国的根基。这个想法,在他心中越来越清晰。

机会出现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当时,中德两国决定在山东峄县合办"华德煤矿公司",张莲芬担任中方总办(华总办)。一上任,他就敏锐地意识到,与洋人合作必须守住底线。在公司章程中,张莲芬明确写下:"洋总办许其稽核银钱出入,考查公司情弊,但不得揽权掣肘。"这条规定,牢牢锁住了核心事权在华人手中,在合作之初就努力维护着中国对矿产资源的自主权,不让洋人轻易插手核心事务。

然而,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德方承诺的投资迟迟不到位。面对困难,张莲芬没有被动等待,而是一方面积极招募华股,通过旧资产作价入股、招募新股等方式,迅速集齐华股本银120万两,一方面主动抓住时机,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毅然上书朝廷,请求收回矿权,由中国人自行开办。

为了全身心投入这项事业,张莲芬甚至辞去了山东盐运使的官职,朝廷感念他的赤诚与决心,特赐他头品顶戴以示嘉勉。于是,"山东峄县中兴煤矿有限公司"诞生了——这是完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煤矿公司。这面旗帜在列强资本环伺的夹缝中,顽强地树立了起来,历经张莲芬数年的苦心经营,至1914年,中兴煤矿年产量已高达25万多吨,跃居全国第四。

巧妙周旋护矿权

经营煤矿,光有矿不行,还得运出去。张莲芬深知交通就是煤矿的命脉,克服重重困难,于1906年至1912年间主持修筑了从枣庄到台儿庄的运煤铁路(台枣铁路)。他又购置船只,组建起运煤船队,总运力达千余吨。沿着古老的运河,顺着奔腾的长江,中兴的煤被运到济南、浦口,销往江浙,甚至远渡重洋出口到日本和东南亚。他还在交通要冲如台儿庄、镇江、浦口等地广建码头和分销处,构建起庞大的销售网络。

打下基业难,在内忧外患下守住基业更难。在煤矿产业的竞争中,矿区的范围(矿界)是核心利益。早在公司筹建之初,张莲芬就报请清政府"明定界域",成功争取到"公司10里之内不准私开煤矿"的特许权,严格规定范围内不准私人乱采滥挖。这自然触动了地方豪强的利益,以豪绅崔广源、崔广澍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对张莲芬进行了不断的诽谤诋毁。张莲芬没有退缩,他据理力争,一次次上书陈情,揭露对方的劣迹。最终,官府支持了他的主张,判定崔氏"肆意诬诋",严令其"不得再干预地方矿事",维护了中兴矿权的完整。

与此同时,德商也并未死心。在台枣铁路修建期间,德方控股的胶济铁路公司看到中兴公司资金紧张,想趁机投入巨资控制其铁路命脉,张莲芬一眼便看穿了对方的企图。他立即召集股东商议,拒绝了德方的控股要求;在向德国洋行借款时,合同里也白纸黑字写明:"不能以矿产作押"。张莲芬走的每一步路都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份属于中国人的产业。

张莲芬明白,办好实业,人才和设备是关键。他一方面大胆启用像邝荣光、朱言吾这样有真才实学的本土工程师,一方面也聘用德国技术专家,主张"兼取中西诸法,择其善者用之"。他斥巨资从德国引进当时先进的锅炉、大功率绞车、发电机、铁路机车等设备,让中兴煤矿的生产力不断提升。

星火燎原遗泽长

天有不测风云。民国四年(1915年),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中兴煤矿,南大井突发严重矿难,损失惨重。这场悲剧,很大程度上源于德籍总矿师高夫曼的错误判断,最终酿成四百多名矿工遇难、三百多人受伤的惨剧。眼看毕生心血遭受重创,张莲芬忧愤交加,大病一场,在强撑病体处理善后事宜之后,最终于1916年溘然长逝,归葬于故乡余杭的闲林梅花山。

张莲芬走了,但他点燃的实业火种并未熄灭,他的次子张学良(字仲平)继承了父亲的遗志,进入中兴公司,后来担任主任董事、总经理首席助理。1927年,由于时局动荡,中兴煤矿一度停产,濒临绝境。危难时刻,张仲平毅然将自己天津的住宅抵押,解了公司的燃眉之急。在他的努力下,中兴公司不仅得以复苏,更一度成为全国第二大煤矿。

1938年,日军的铁蹄踏进枣庄,觊觎着这座富饶的煤矿,逼迫中兴公司签署"共同经营"条款。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张仲平和全体董事做出了坚定的决定:"一致抗战,绝不与日本人合作!"他们将总办事处迁往上海,将重要设备抢运到大后方,并炸毁了新建的连云港码头,甚至不惜将运煤船沉入大海,展现出了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1940年,张仲平在上海病逝,年仅50岁。

如今,在张莲芬的故居苕溪村凌村营,张氏家族祠堂作为张氏陈列馆对外开放,并在2015年被列为杭州市文物保护点。

陈列馆画像上的张莲芬端坐着,目光仿佛穿越了百年时光,静静凝望着这片生养他的土地。他从这里出发,历经乱世离散、宦海浮沉,最终在民族工业的荒原上,筚路蓝缕,开辟出一片天地。他的根深植于余杭沃土,他的梦随着运河的煤船驶向远方。他的故事,是苕溪水滋养出的坚韧,更是一个赤子实业报国的漫长跋涉,至今仍在余杭潺潺不息的河流中,悠悠回响。